

2002 年 6 月 26 日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的摘錄

X X X X X X X X

《香港高等教育》報告

REPOR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楊耀忠議員：本人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於今年 3 月 26 日發表了題為《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本人在 4 月 4 日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首先批評兩個月的諮詢期太短，要求延長諮詢時間。政府最後將諮詢期延長至 7 月底，這種從善如流的做法，是值得讚賞的。

以宋達能爵士領銜完成的這份報告，描繪了香港未來 10 年高等教育的發展路向，其中提出了不少具震撼性的發展策略建議，引起了社會廣泛的討論和爭議。由於高等教育對香港經濟的轉型和社會的發展極為重要，本人認為有必要在立法會就該報告進行辯論，要求政府充分聽取，並認真考慮各位議員的意見，然後再對報告作出修改及定奪。

由於前個星期，何鍾泰議員的議案已着重討論了副學士課程問題，以下本人將就大學教職員薪酬與公務員脫鉤、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資源分配等幾個主要問題，代表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發表意見。

主席女士，大學教職員薪酬與公務員脫鉤，是整份報告中最敏感、最具爭議的建議。支持者的理據是，全世界罕見大學教職員薪酬與公務員掛鉤，脫鉤有利於聘請世界一流的教授來港任教，打破“大鍋飯”的作風，增加聘任條件的彈性。然而，反對者認為脫鉤會損害大學教職員的穩定性，肥上瘦下，加劇擦鞋文化現象，不利於學術自由。他們認為現在正進行公務員薪酬檢討，若公務員減薪，大學教職員願意跟隨減薪，但強烈反對脫鉤。民建聯認同，長遠而言，大學教職員的薪酬不應與公務員掛鉤，但現時並不是脫鉤的適當時機，因為大學教職員尚需要時間建立對管理層的信任，加上現時大學教授和講座教授的薪酬並不封頂，是有機制聘請世界一流知名教授的，因此，無須急於脫鉤。

我們認為，當局只有符合以下 3 個條件，才可以考慮讓大學教職員薪酬脫鉤：一是政府確保脫鉤有助提升本地大學質素；二是大學提出的薪酬替代方案要廣為教職員接納；三是各大學設立完善的上訴機制，讓教職員可就薪酬、陞遷等安排有上訴渠道。

不少大學過去幾年已因資源問題，削減職位，或重整薪酬制度和職位。教職員擔心脫鉤後，裁員和減薪潮將湧現。由於脫鉤涉及所有大學教職員的利益，所以，只有獲得他們的認同和接納，才可落實。學者有穩定的工作環境，才會孕育慎密的思維及創造性的意念。試問“飯碗”難保，又怎會想出“好餸”來煮？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MRS SELINA CHOW, took the Chair.

薪酬脫鉤後，人事及工作安排，一定會引起部分員工的不滿。過去 1 年，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教育學院的裁員事件，已令我們引以為鑒。所以，如果大學不認真設立具透明度的申訴渠道，處理因薪酬脫鉤引發的不滿，高等教育界可能會“毫無寧日”。當局若不能處理好上述問題，實在不宜立即推行薪酬脫鉤。

即使以後推行脫鉤，當局亦必須承諾不會削減對大學的資助。民建聯認為，任何撥款機制的改變，都不應導致政府削減對高等教育的資助。至於新增的額外資源，則可以較多地投放於重點大學和卓越學科領域。

代理主席，另一個具爭議性的建議，是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民建聯贊成院校之間建立學分轉移、學分互通制度，但不贊成“錢跟學生走”。附錄五的建議，實際是大學學券制。現時，世界還沒有地方實行這樣的大學學券制，香港是否有必要急於做“白老鼠”？

其實，推行此制度的理據是十分不足的。在外國，實行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的目的，是方便學生轉校轉系，但不會限制大學的資源。如果為方便副學士學生升學，大可增加資助學額；如果要促進大學學生流動，院校之間亦可辦學生交換計劃，或加強院校之間的課程合作，無須動此大手術。

本人不相信，在大學引入市場力量，憑學生的選科，便可以提升大學的質素。某院校學科受學生歡迎，不等於該科有卓越成績；在外國，有些學系為求保持受學生歡迎程度，在評核學生分數上刻意“手鬆”。不要忘記，名牌效應確實影響着香港學生的選擇。

我們亦擔心，在這制度下，各院校為了吸引學生入讀，防止經費隨着學生的離去而流到其他院校，可能會爭相開辦一些受學生歡迎的科目，亦會削減部分學系的資源或學額，甚至停辦某些學科。最有可能被淘汰的科目，是

一些不太受歡迎、但具學術價值的科目，又或對學生嚴厲的教授所教的科目。如果是這樣，此建議與鼓勵大學“各有分工、各展所長”的目標，豈非背道而馳？

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的英文名是 **CATS**。這種法力無邊的“貓”，由於對大學獲得多少資源，操生殺大權，所以是沒有人喜歡的。但如果這種“貓”被削去法力，只懂乖乖地幫學生運送學分，可以變成一種受歡迎的“貓”。

代理主席，報告雖然迴避了研究型 and 教學型的分類，但發展重點大學的意圖仍是很清楚的。重整大學資源，騰出更多資源予重點大學。現時 8 所大學之間的差距不是很大，水準參差程度也不是很嚴重。8 所大學開辦的課程，部分存有競爭，但部分各具特色，存在分工。每所大學都聘有知名學者，成績好的學生亦不是集中在一兩所大學。如果我們接受報告內的建議，將資源集中在幾所重點大學，屆時將會出現兩極分化，這是否我們樂意見到的？

民建聯認為，發展世界一流大學的方向是正確的，但不能以削減其他大學的資源作為代價，這樣的代價實在太大。去年，教資會決定削減部分院校三年度的經費，已經令個別院校叫苦連天。減肥瘦身，只能減到一定程度，絕不能減至剩下一副骨頭，這是不健康的。如果我們接受所有建議，就等於從一個已經營養不良的人的身上，搶走他的食物，再分給身體健康的人。當然，我們贊成課程的開設，各所大學應作出協調，有所分工，以善用資源。

民建聯支持發展以辦學使命及院校表現為基礎的撥款機制，教資會應制訂院校的表現指標。不過，評核研究表現的指標相對較易，評核教學表現的指標如何確定，則是一個難題。兩者都必須做到公平、客觀和精確。在制訂研究表現指標時，當局要支持對社會及經濟發展有益的本土研究，不能歧視以中文發表的研究。

民建聯支持報告建議賦予教資會更多的職能，加強其策略性作用，以帶領高等教育的發展。當局應制訂政策，吸引內地及鄰近地區的學生入讀香港的大專院校，除可擴闊本港大學生的視野，進行文化交流，亦可增強競爭意識，提高教學質素，促進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將香港建設成為亞太區的教育中心。

現時，大學的管治和管理存在不少問題，如校董數目過多，校董會流於形式、受制於管理層、沒能肩負起管治的重任、大學的管理層權力集中，未能完善監察和制衡的機制等。民建聯支持各大學的管治組織對大學的管治和管理架構進行檢討，在確保大學院校自主的同時，各校應增加校內的民主程度及向公眾增加透明度。在健全各校獨立、有效的投訴機制的同時，民建聯

認為將受資助院校納入申訴專員公署範圍，可以提供多一條投訴途徑，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報告的範圍顯然過於狹窄，對大學收生準則的改革、與高中課程的銜接、“三改四”、提高大學生質素及高等教育的發展目標等論述欠奉，對現狀的利弊分析不夠透徹，對大學的管治和管理方式如何改革語焉不詳等，這些不足之處都有待當局加以改進。

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謝謝代理主席。

楊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察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題為《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張宇人議員：代理主席，對於教育投資及改革，自由黨一向是支持的；對於高等教育，我們更是十分關注，因為這直接牽涉本港的人力培訓。另一方面，我們認為公帑的付出與大學生的質素應成正比。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提出的《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整體而言，的確就本港高等教育提出了具有遠景的改革建議及路向，但同時也提出了一項翻天覆地的變革建議。

報告主要涉及 4 個範疇，包括“擇優撥款”原則、“學分轉移制”、“院校教職員與公務員薪酬脫鉤”，以及“副學士及與副學士相若課程轉為自負盈虧”，引起了教育界及社會上不少討論。

首先，關於擇優撥款的原則。其實，教資會為了使有限的資源達到最佳效益，建議將政府的研究資源及私人捐助集中在少數表現卓越的院校上，使這些院校有能力參與國際最高水平的競爭，是值得支持的。有關詳情將會由代理主席在稍後發言時提及。

然而，一些教育界人士卻憂慮，重點撥款難免會出現將大學分等級的標籤效應，拉遠院校間的差距，更可能令部分大學放棄它們的研究成果，這樣只會妨礙良性競爭。此外，歷史較長的大學與近年才升格的大學，起步點不相同，新的大學未有足夠時間趕上“老牌”大學，便要面對擇優撥款，似乎有欠公道。故此，自由黨認為當局在過程中應多作諮詢。

我在去年 6 月 27 日有關高等教育的辯論中也曾經提出，在增強競爭力、提高質素的大前提下，於本港推動私立大學發展，是大有可為的。此外，外國大學獲得很多私人捐獻，並成功和商界建立緊密聯繫，這是值得本地大學借鏡的。自由黨建議，院校及當局應多瞭解商界的運作及需要，務求令培訓出來的人才更切合商界及社會的需求，從而吸引更多商界捐款，以紓緩專上教育資源及研究經費不足的問題。政府又可以考慮透過稅務安排，鼓勵商界捐款。

第二，報告提到學分轉移制。自由黨原則上不反對為學生提供更多選擇，但報告建議的模式，似乎是全世界所無的，我們對建議有保留。在建議制度下，學生無須取得原校的同意便可轉往他校修取學分，這對院校的財政資源穩定性、課程策劃及編排，以至培養學生歸屬感等，均會帶來很大沖擊。

以我自己在美國求學時期的經驗，外國普遍採取的學分轉移制度，是學生如希望轉移學分往他校，須先向原校結算清楚自己已修讀了多少學分，再由新學校決定究竟承認該學生多少學分，便將學生所修的學分轉移至新學校，而該學生與原校的關係將結束，學生亦只會在新學校註冊畢業。但是，根據報告的建議，除了大學一年級外，學生不管在外修讀多少學分，卻最終會在原校畢業，這可能會導致學生在原校修讀的時間較在他校修讀的時間更短的荒謬情況。

再者，在課程銜接及學分認可方面，新建議仍有很多含糊未清的地方，容易引起混亂；加上這或會引致院校為了爭取更多學生以取得額外資源，而罔顧收生資格及課程質素。又如學生在某大學讀了幾天便退學，學費應怎樣分配？大學是否要搶學生“填氹”呢？所牽涉的行政費又該由誰負責？弄得“立立亂”，又有甚麼好處呢？況且，八大也異口同聲反對此建議，自由黨認為當局應對此再詳加研究。

第三，談到大學教職員的薪酬與公務員脫鉤一事，自由黨一向強調大專教職員薪酬要具備彈性。事實上，環顧全球大學人員，其薪酬與公務員掛鉤的做法是十分罕見的，這既缺乏彈性，更箝制了大學的發展。自由黨一向認為，公務員薪酬架構有檢討的必要，非政府機構或大專院校的薪酬根本不應與公務員掛鉤，故此，自由黨是贊成脫鉤的。

另一個備受爭議的副學士及相若課程自負盈虧的問題，立法會上星期已作出討論。自由黨重申，要達到六成青年接受專上教育的目標，未來 10 年要讓額外 30% 的青年達到大專程度。然而，政府並沒有額外資源可供擴充大專教育，自由黨也不想看到大學現有資源被削減，所以，我們贊成新辦的副

學士課程應自負盈虧。至於與副學士程度相若的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它們對培訓工商業專業人才的貢獻由來已久，加上成效顯著，所以，政府應繼續保留對這類課程的資助。再者，當局也不應將着重通才教育的副學士學位課程，與注重培訓專才的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混為一談。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楊森議員：代理主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於 3 月下旬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它給公眾的信息是，政府今後將會着重教育投資的經濟效益，強調由於資源有限，鼓勵院校間競爭資源，並提倡政府按照“擇優原則”投放資源於高等教育。這論調似乎與政府致力增加大專學生比例至六成的目標相違背。

代理主席，我打算就着這份報告提出民主黨的 4 個觀點。

第一，民主黨反對副學士私營化。《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引入一套名為“公營副學士學位以私營理念經營”的理論，建議大部分副學士課程日後以自負盈虧形式營辦。目前，政府給予 8 所大學的一般學士課程學生的資助約為課程所需費用的 82%，而改革後的副學士學生則要面對每年約 16 萬元的學費。新建議必然會淘汰為數不少缺乏金錢的副學士學生。有能力負擔高昂學費的學生恐怕亦會選擇往外地升學。

在工業革命以後，各個國家的教育都趨向普及化、大眾化為原則，以期提高國家整體的教育水準和生產力。但是，我們在慶賀教育普及化成功之餘，卻忘記了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忽略了每個學生個人價值的存在。因此，在目前人力、財力和土地資源限制下，探討如何可以兼顧教育大眾化和教學過程個別化，正是每位從事教育工作者的責任。

目前，佔適齡大專學生入學率 18% 的學生來自社會各階層，不少低下階層的學生亦藉着入讀大學進修，取得有關的資歷，繼而改善其在社會的背景及階層。事實上，一個民主國家的教育政策，在推動教育普及化後，也應該開始注意教育的公平化的問題。香港理工大學最近的一項調查資料顯示，其校內學生的家庭平均收入約為 2 萬元。換言之，即使政府設有助學金和貸款資助，對於大部分家長而言，大學學費始終是一個沉重的經濟壓力。將來以自負盈虧形式營辦的副學士課程學費，動輒要十多二十萬元之多，間接扼殺了家境欠佳的學生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更令學生藉着社會流動改善生活的可能性大大減低，拖慢社會整體的發展。

第二，民主黨反對大學教職員薪酬與公務員薪酬機制脫鈎的建議方案。雖然市民大眾和自由黨都認為，大學教職員薪酬由院校自行釐定，更能提升教學質素的正面效果。不過，民主黨恐怕脫鈎建議實際上是由於政府面對財政壓力，為了節省開支，不得不向大學教職員薪酬打主意。況且，財政司司長亦已明確表示，會嚴格制訂各個部門每年開支的增幅上限。

其實，現今大學教授的薪酬已相當吸引，而現時一筆過撥款的安排，已能使學校有足夠的彈性調動薪酬。該報告聲稱脫鈎是為了使各院校能夠有更大彈性和吸引力招聘國際知名的教授。不過，實際上，這些國際知名的教授，願意來港任教的為數不多，因為他們不單止考慮薪酬，還要考慮進行研究的環境。在這一方面而言，香港傳統上不是太強的。政府以這麼薄弱的理據，否決了全港大學教職員一直行之有效的公務員薪酬機制，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第三，就實施大學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民主黨支持學生的選擇自由，但到了日後實施此細節的階段，我們卻有所保留。我們所持的理由是，現時的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與撥款掛鈎，始終不是一個理想的制度。假如現時享受教資會資助的 8 所院校在名氣、規模及教研的取向，都是不相伯仲的話，那麼，引入這個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必定會激發院校之間的良性競爭，對學生、學校和社會都有很大的益處。然而，現實卻是，本地 8 所院校並非不相上下，羣眾盼望入讀名牌大學的心態始終存在。新興的大學在實施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下所受到的影響會非常大。因此，民主黨期望政府在制訂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時，除了研究該制度與撥款脫鈎的可行性外，亦同時加倍注意本地各大院校本身的獨特性，以及配合相應的收生準則，確保不會出現收生不足或院校合併的情況。

第四，民主黨支持以研究表現來撥款，贊成“擇優撥款”，但當局不應該因為資源問題而把資源分配予少數院校。

誠然，真正的競爭在於讓各院校發揮其卓越的學術領域，我們認為當局必須修正及改善現時的“研究評估”工作，讓各院校代表能夠參與整個評估的過程，不要讓以傳統學府為主導的評鑒委員會專美。

古人說得對，要動用整條村的資源才能夠培養出一個大丈夫，用英語說，即 **"It takes the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man."**。因此，高等教育改革有賴社會各方面的支持和認同，還要有充裕的資源投放，才能培養出優秀的人

才。民主黨敦促政府詳加研究我所提出的 4 項由改革建議所衍生的弊病。要知道，教育界殷切的期望和善意的批評，是促進教育演進的一股重要推動力。

謝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譚耀宗議員：代理主席，上星期二，我作為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委員會見了職訓局屬下的職工會代表，代表們強烈反對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取消職訓局的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的意圖，而《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提出公營的副學士學位課程的財政安排必須明確，以配合政府期望副學士學位課程主要為私營的理念。報告又建議政府成立延續教育局，以引領由公營及私營機構開辦的副學士學位課程及程度相若的課程的發展。報告所提出的政策方向，對未來職訓局的發展影響深遠。

目前，職訓局除了透過訓練中心培訓各行業的操作工、技工、技術員及技師外，其屬下的專業教育學院也提供各類職業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按照報告的陳述及近期政府的表態，職訓局的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屬於和副學士學位程度相若的課程，政府將考慮減少對它們的資助，並由未來的延續教育局統管。對於這個政策方向，我覺得必須進一步詳細探討，不能倉卒定案。

職訓局在香港職業教育培訓制度中長期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職訓局為青少年提供機會，以學習各類工作的專業技能，使他們在日後的實際工作上，學以致用。職業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副學士學位課程，因此，政府不應該將副學士課程的資助政策套用到職訓局的文憑課程身上。其次，現時中三程度的青少年修讀完職訓局的證書或中專課程之後，能夠透過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這些途徑進一步獲取及提高工作技能，如果政府取消對文憑課程的資助，無疑直接扼殺了這些青少年進修的機會。現時文憑或高級文憑課程的學費是 13,700 元，如果政府取消有關資助，學費則最少必須提高二點七倍到 37,500 元（這是現時職訓局屬下工商資訊學院開辦自負盈虧的副學士課程的收費水平），可想而知，大部分學生都會因為高昂的學費而卻步。

政府 1996 年所進行的職訓局策略檢討報告曾經指出，職訓局所提供的職業訓練，應繼續由政府資助，政府不應採取急進措施將訓練課程私營化。去年 9 月，政府提出的職業培訓及再培訓組織架構檢討報告也指出，在政府成立人力培訓委員會前的過渡期間，職訓局應該維持現行的職能。在對未來職訓局的角色及走向尚沒有最後定案之前，貿然取消對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的資助，只會引起社會不必要的爭議，並使教師及學生不安。

《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特別提及副學士課程的管治安排，是因為副學士學位課程的發展與高等教育有關。報告並沒有探討對副學士學位的資助政策，只是跟從政府的資助政策指向。但是，正如本會在兩個星期前通過的副學士學位議案所言，政府應該增設副學士課程的學費資助，以減少青少年的學習負擔。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曾經針對那些既非在學進修，亦非就業的青少年，或簡稱“雙失青少年”做過調查，其中四成半人表示，能否繼續讀書要視乎“自己的經濟能力能否負擔”。職訓局所提供的文憑課程，是他們學習工作技能的主要途徑，如果政府取消課程資助，對他們來說，等到有經濟能力才進修，恐怕是一件頗為遙遠的事。政府在改善高等教育，增加專上教育機會的同時，實在不應該以犧牲青少年職業教育機會作為代價。

我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香港正轉向知識型經濟，而將來的發展是否成功，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本港是否有足夠具有高等教育程度及切合市場需要的人力資源。事實上，政府亦意識到這方面的重要性。行政長官在 2000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要在 10 年內將高等教育的普及率提升至 60%的目標。因此，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對本港將來有深遠的影響，而早前英國愛丁堡大學校長宋達能勳爵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內的一些建議，正好為我們提供這方面的討論基礎。

考慮到有限的公共資源，報告建議發展重點大學，突出少數院校為政府資助及私人捐助的主要對象，並使這些大學成為國際上具競爭力的院校。要達到此目的，報告提出把大學分流使其各展所長，按本身的條件定位。但是，對於大學定位為研究或教學為主導的問題上，本人則有所保留，因為研究基本上是大學的重心，也可謂是它們的靈魂。

然而，每所大學都有它本身的特色，獨特的發展背景及學術文化。雖然受到資源限制的壓力，有關當局也不應基於一些不利於弱勢大學的準則來作出所謂“擇優”，扼殺一些歷史較短但具發展潛質學院的發展。

至於報告的另一項建議：“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本人亦有一些意見。無可否認，學分制度是一個較為富彈性的制度，同時亦可為社區學院和

副學士學位課程的畢業生提供銜接途徑。但是，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那些就讀於弱勢高等院校但成績較好的學生，在實施學分轉移制後，很可能會轉到其他的“名牌”高等院校。在“錢跟學生走”的前提下，將會進一步削弱“非名牌”院校的資源及競爭力，導致不公平的情況。此外，部分高等院校內的個別學系亦有可能會開辦一些容易取得合格成績的課程以吸引學生報讀，因而令教育質素下降。這些都是有關當局必須正視的問題。

報告也花了不少的篇幅論述有關副學士學位，這亦是促使本人在本月 12 日在本會提出關於“副學士學位”議案的原因之一，承蒙各位同事的支持，議案順利獲得通過。本人的議案主要是着眼於副學士學位的質素，因此，本人認為報告內有關成立延續教育局及設立一個副學士學位課程質素保證機制的建議，值得進一步研究。

代理主席，高等教育的需求與社會發展是息息相關的。我們在決定增加高等教育學位及所開辦的課程時必須緊貼社會的需求，避免造成人力資源的錯配，例如某些學科畢業同學人數遠超市場的需要，令同學們學非所用或甚至失業，浪費了他們在金錢及時間上的投資，而且也白白浪費了大量社會的資源。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代理主席。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宋達能勳爵的《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偏向為政府開源，將高等教育推向私營化和市場化的方向，是一份市場融資報告多於大學教育發展報告。

但是，市場不是萬應靈丹，報告在教育界掀起連場爭議。在日前的辯論中，我已經反對政府撤銷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的資助。今天，我將就報告的其他重點建議，提出意見。

報告最惹火的建議，是大學教職員薪酬與公務員脫鉤，傷及大學的“龍骨”，後患無窮。

曾蔭權和梁錦松都批評大學的成本過高，但對大學的研究經費“遠遠落後於經濟上的主要競爭對手”，只佔本地生產總值 0.48%，卻避而不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說，“脫鉤”可讓大學薪酬更具彈性，能與世界各地競爭人才。但是，香港研究經費已先天不足，如果連主流的聘用制度，與公務員薪酬掛鉤的“實任制”也受到沖擊，就不能提供穩定的工作環境，豈能吸引海外學者？豈能讓學者專心教學與研究？事實上，現時大學聘用高層教員時，在釐定薪酬上已有一定彈性。如果學者的工作朝不保夕，學術自由也就成為空話，這正是大學教職員堅決反對脫鉤的深層原因。

大學教職員反對脫鉤，也反映大學的民主機制不足。近年，大學校園風波鬧得滿城風雨，教職員在申訴無門下，被迫向立法會求助。大學以院校自主作為擋箭牌，逃避社會的問責。例如：去年教育學院強制裁員事件，即使立法會多次邀請，校方也拒絕溝通，交代進展；月前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風波，校方也是一拖再拖，至學期結束才成立調查委員會，校內師生早已怨聲載道。

代理主席，我尊重院校自主的精神，我同意立法會不是處理大學糾紛的理想地方。對於報告的建議：成立獨立的申訴專員制度，我認為仍然有不足之處。因為，申訴專員和立法會一樣，只可以就院校是否偏離程序和法規作出調查，但卻沒有足夠的能力處理學術的紛爭，但學院的申訴很多時候與學術相關。

大學是社會的良心，如果大學沒有民主，教職員和學生噤若寒蟬，良心也會沉默。大學要院校自主，但教職員卻投訴無門，院校自主變成高層專權，自主也成為諷刺。因此，我認為政府和大學應推動校內的民主，在大學條例中明文規定，教職員和學生有更高程度的、更獨立的機制，參與校政，處理投訴。

報告提出突出少數院校作為資助對象，院校合併也上了議程。一時間，大學鬧出了不少迫婚的愛情故事，公開談婚論嫁。事實上，本地大學的歷史各有長短，發展各有先後，要與世界競爭，應該首先加強合作，發展本身的強項，互補不足而不是互相吞併。同樣地，報告建議將學分轉移與撥款掛鉤，也會影響大學的健康發展，動搖了院校的生存基礎，令教育變質。因此，我反對學分轉移與撥款掛鉤，政府和教資會應先鼓勵院校交流，例如增加院校旁聽生的名額，而不是借刀殺人，借學分轉移迫院校結束一些學系。

代理主席，大學資源捉襟見肘，教職員怨聲載道，社會時有所聞。一向敢言的候任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應該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體會當然比我深刻。當政府連續 6 年削減大學撥款時，李校長大聲疾呼，要政府承擔未來 5 至 10 年，學生競爭力可能下降的責任。當政府計劃將大學教職員薪酬與公務員脫鉤，李校長也擔心政府可能再次削減大學資源，要政府白紙黑字，將雙方同意的條款寫出來，讓院校有法律途徑追究政府，確保政府不會反口。當報告提出資助重點大學時，李校長很有信心其所領導的大學會成為本地的“精英大學”，還說：“希望只得一間”。

在其位，謀其政，是正常的事。李校長先前的觀點，當然是以香港中文大學為中心。現在，香港已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新人事、新作風，我希望

李校長陞任局長後，不要忘本，不要忘記大學在緊縮經費下的艱難，不要忘記教職員和學生的期望。當然，他將要全面地看大學的發展，不單止將自己的大學經驗，更要將各大學的教職員，將社會和基礎教育的聲音，作為制訂大學政策的基礎。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的教育制度正處於變革的時候，為回應知識型經濟的發展對人才培育提出的新要求，同時要滿足本港經濟轉型的人才需求，便須培養本地更多高質素的人才，這早已是社會的共識。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要面對如何提升教學質素，提供更多教育機會的挑戰。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對本港高等教育日後的發展，將會有十分重大和帶根本性的影響。因此，政府必須充分諮詢各方面的意見，包括市民大眾、學生、各高等院校，特別是院校的教職員等。報告提出後，政府接受了初步的意見，把原定諮詢期延長兩個月，這是值得讚許的，讓市民可就此影響深遠的報告多作瞭解及多發表意見。然而，要真正考慮各有關團體及人士提出的種種不同意見，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本，思考報告中提出的各項建議。

這份報告提出了 12 項建議，有不少人認為報告只是圍繞一個主題來進行不同的變奏，那主題便是如何在有效控制政府投入資源的情況下，從質和量方面提升高等院校的教學，以應付未來發展的需要？驟聽起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有關教育資源的問題，一份香港教育開支的研究¹根據世界銀行發展的全球發展指標及聯合國公布的全球教育指標指出，在 96 年度，香港用在教育的公共開支佔國民生產毛額(GNP)2.9%，比美國的 5.4%、日本的 3.6%、南韓的 3.7%及新加坡的 3%為低。

研究並指出，在中小學方面，它們的經費佔教育開支的比例，香港的百分比低於大部分國家；而在大專方面，香港的百分比達 37.1%，與新加坡及加拿大接近，較美國的 25%為高。

¹ 張俊森、梁嘉銳，香港在教育方面的公共開支多不多，收錄於張妙清主編《教育改革與香港：新紀元、新挑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及教育研究小組出版，2001 年 5 月

驟眼看來，香港在高等教育的投入似乎毫不遜色，甚至高於美國。然而，與香港不同的是，美國有大量的私立大學，而香港絕大部分的高等院校是由公帑資助的。因此，香港對大專教育的整體投入相對地並不算多。

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重申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要“大力投資於教育，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迎接知識經濟的來臨”。我們都明白，香港的經濟情況已不如數年前的蓬勃，未來經濟仍將會面對不少困難，同時亦有不少社會問題有需要處理。雖然如此，政府仍應盡力在其能力範圍內繼續對教育作出承擔，這既是政府應負的責任，同時也是為了確保不會有人因經濟問題而得不到讀書進修的機會。

對一般家庭來說，現時每年四萬多元的大學學費並不是一個小數目。近年來，大學生的就業前景也相當不明朗，而申請貸款資助，畢業後即面對十多萬元的債項，壓力不可謂不大。報告建議大部分的副學士學位課程，以自負盈虧形式運作，如果建議得以推行，相信日後大部分的副學士學生將須負擔相當數目的學費。雖然政府承諾提供貸款作資助，但修讀這些課程的學生將會面對更大負債負擔的壓力，而各有關院校也要面對平衡收支的壓力，能否同時兼顧課程的質素，實在存有很大的疑問。最終可能只達成數字上的教育目標，而不一定能落實真正的培育人才。

報告建議按擇優原則，突出少數院校為政府資助和私人資助的重點對象，提升它們參與國際最高水平競爭的能力。香港現有 8 所資助的高等院校，其中數所規模較小的大學在這數年間也各自發展出優勢學科，並培養出不少表現出色的學生，可見大學的優劣不在於大小。

報告建議政府從策略角度指定少數院校，這項建議引起一連串的疑慮：突出及獎勵表現卓越的教學及研究單位固然重要，所謂表現卓越須有一個客觀公平的評核標準，更要有學術上的衡量，政府的指定能否體現其中的標準？同時，只着重獎勵卓越者，資源集中，會否造成日後的優勢壟斷，反而不利長遠發展？過往院校之間的自由競爭造就了各自不同的成就，指定形式的擇優會喪失良性競爭的互動。

教育目標是以人為本的，教育質素的好與壞的關鍵之一在於前線教研人員。報告中建議高等院校教職員的薪酬及聘用條件與公務員制度脫鉤，認為藉此可聘請及留住最優秀的教職員。這項建議引起不少大學教職員的反對。

脫鉤建議容許院校自由制訂薪酬方案，對不少學者來說，薪酬條件固然是考慮應聘與否的其中一個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學校具備良好的學術氣氛及

教研環境。況且，現行的制度下亦有一定的彈性，容許學校以較優厚的條件聘請國際級的學者。

報告中一連串的建議，如脫鉤、撥款與表現掛鉤等都容易產生大學市場化的弊病。為了爭取更多的公帑及其他社會資助，院校惟有開辦更多工商學科，而脫鉤容許院校以較優厚的條件聘請這些學科的教研人員，相反，人文學科的發展便會受到忽視。

更值得注意的，是脫鉤對大學學術自由的長遠影響。現行掛鉤的機制為大學教職員提供了穩定的研究及工作環境，脫鉤後，便更要講求教研的成果，教職員有需要適應新的評核機制的要求，更要講求教研成果。可是教育的成果並不容易量化，而研究的成果更不易事先預知，因為必須有一定的研究過程。

歸根究柢，香港的教育最值得關注的，仍然是質素問題。綜觀這份報告，似乎只聚焦於資源的問題，而沒有深入探討廣受公眾關注的教育質素。新的教育統籌局局長即將上任，希望政府能在教育問題上多聽取公眾意見，釐清政府對教育的承擔。謝謝代理主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立法會今天辯論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涉及的不單止是香港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還涉及大批在高等教育前線工作的員工，以至無數莘莘學子的成長。

報告在第一章開宗明義指出：“本報告書仍然有其定位，就是把高等教育視作整個專上教育的一部分。專上教育至少包括另外兩個界別：職業教育和培訓，以及最近發展的社區學院……”不過，報告並未能把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培訓、社區學院 3 個部分恰如其分的作聯結。報告花了不少段落大談最近興起的副學士學位課程，不過，觸及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幾近空白。難怪職業教育工作者批評政府有心把副學士學位課程與文憑、高級文憑課程混為一談，指鹿為馬的想把職業教育課程等同大專院校開辦的副學士學位課程。

我認同職業教育前線工作者的區分，副學士學位課程側重於通識科目，學生的主要目標和發展是升讀學士課程；而文憑和高級文憑課程的重點則是專業學科，屬於職前教育。報告在大談副學士學位前景的同時，實在有必要釐清職前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職業教育工作者擔心政府借高等教育的檢討，推卸對職業教育的承擔。在報告的建議摘錄 3 稱：“成立延續教育局以引領由公營及私營機構開辦的副學士學位課程以及程度相若的課程的發展。”有從事職業教育的老師向我表示，所謂程度相若的課程便是指職前教育，報告建議引入私營機構開辦，是為政府準備減撥有關資源鳴鑼開道。儘管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強調政府無意停止資助高級文憑課程，然而對於整個職前教育，政府並無明確的承諾。在教統局回應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教師會的信件中，只是強調：“若報告的建議落實，有關當局將會與個別院校磋商，訂定在合乎資助準則下能繼續獲政府資助的課程。”這意思是否包含了部分現時獲得政府資助的課程，將來不可能或不會繼續獲得資助？因此，教統局的承諾，並未能平息員工的擔心。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政府現正大力推動知識型經濟，對於種種原因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青人，可能已自覺是人生旅途上一項重大的挫折，如果政府在政策上仍想逃避對職前教育的承擔，對這些不幸的青人無疑是雙重打擊，如果讓這些負擔不起昂貴學費的青人放任自流，苦果最終亦要由社會承擔。

主席女士，我並不熟悉高等教育政策，但在讀罷報告後，我對報告第 1.17 段決斷地把“大學的主要功能……是創造經濟機遇的動力……”感到十分錯愕。也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祖訓經已過時。然而，如果報告建議把本港大學變成變相的技術工廠，與外國對手競賽，我便要在此借用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教授在《大學之理念》一書的數句說話來結束我的發言：“大學不是詩人的生地，但一間大學如果不能激起年輕人一些詩心的迴蕩，一些對人類問題的思索，那麼這間大學之缺少感染力是無可置疑的。”金耀基教授在書中的末章還語重心長引述了前美國國家教育委員會會長的說話：“如果美國今天在教育上有危機，這不在考試成績降低了，而在於我們在培育公民的教育上失敗了。”這些語重心長的說話，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引以為鑒。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主席，三個多月前，當宋達能勳爵來到立法會當天，我們還沒法騰出時間來吃午膳，因為要開一個事務委員會會議，他是來公布這份報告的。

當時，我很清楚問宋達能勳爵，他的建議是否想為政府節省金錢，因為在報告提出之前，已有很多揣測，而政府亦面對着財赤等很多問題，所以大家都在想，可能會有一系列的改革或改變，為政府節省開支。然而，宋達能勳爵說得很清楚，會議紀錄內亦載錄了他的發言，他說絕無其事，他甚至說他覺得政府在這方面應投放更多的資源。

其實，我相信局長亦知道，我從前說過，我們香港在整體教育方面所投放的資源，是較我們的貿易夥伴或是與我們相等發達的地方為少。我亦留意到有些司長說這是拜英國人所賜；但我不會忘記，董建華先生和有些行政會議成員在 92 年曾任行政局成員，不過，現在沒必要埋怨誰，或說英國人從前是花在這方面的錢少，我相信，要討論高等教育的改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是，我們應投放更多的資源，盡量培訓人才，當然，教育的理念，不是只為經濟發展的目的。

多年以來，我一直說，大學有些講師的薪酬非常高，甚至高於外國一些著名學府的講師。有些外國的教授也跟我說很羨慕香港教授的優厚薪酬。我沒有提過要削減大學教職員的薪酬，我只是說希望他們的表現與薪酬相稱，而我亦很支持給予大學更大的自由度來釐定教職員的薪酬，我覺得這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主席，現在整個情況出了甚麼問題呢？你可能也知道，今天有一羣大學講師，甚至可能有教授進行請願，他們是受到這方面的沖擊而致。然而，當我們提出改革，而有人表達反對言論時，我們是否便不進行呢？主席，你可能也記得，上星期三，我提出了一項關於種族歧視的質詢，林煥光局長說，社會上有反對的聲音。梁耀忠議員問他有甚麼屬於敏感性的，為何一拖便拖了 6 年，他只說，大家再磨一磨吧。那只是涉及種族歧視的問題，跟我們現時這項題材相距甚遠，也要研究六七年，如果我們再拖得久一些，便又會被朱鎔基總理罵一回了。

然而，在處理一些仍在社會上很具爭議的事項時，我們是否應盲目的向前衝呢？我覺得有些事情，如果大家真的得不到共識，便不應如此做，而且，我今天聽了各黨的說法後，也沒有聽到有誰支持局長向前衝，或建議任由那些教師、職員反對，我們還是要照樣進行的。今天是沒有人這樣發言的，有些人可能是支持局長的，但仍建議局長要先做一點事，就是尋求受影響的人，例如家長、學生、納稅人的共識。局長可能說，這過程需時多久呢？即使是需時一段日子，也是沒有其他辦法的。局長即將轉任為常任秘書長了，但仍會繼續推行教育改革，但如果她在民怨這般沸騰的情況下仍硬要推行，便令我覺得儘管改革是值得進行，也不能支持局長硬向前衝的。

說到脫鈎的問題，我在原則上是覺得沒有問題的，如果大家都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我們便要說服有關的教職員，因為推行的事可能會直接影響他們的利益，不過，我們要告訴他們這是為整體社會的更大公益，我們盡量應該配合，而我們也不主張“大石壓死蟹”。正如張文光議員說，為何脫鈎會具有這樣的敏感度，正因為這是關乎大學教職員的利益。很多講師曾到過本會，出席過不少會議，他們對大學裏的管治架構，尤其是接受投訴的機制，可以說是完全信心崩潰的，因此，當說到大學管治架構他日會在釐定教職員的薪酬等各方面的事宜而發生爭論時，他們之中有很多人覺得是不會獲得公平對待的。所以，我們如何找出一個高透明度、獨立的管治架構，而且還要得到大學教職員、學生、家長各方面都支持的，實在是難度很高的工作，但我們也要嘗試去做。如果我們做不到，也不要硬要推行其他做法，否則，當大學的教職員知道有這回事時，便會產生埋怨，處理得不好，我們便等於在大學制度內埋下一個炸彈。

至於投放多些資源來發展重點大學的建議，卻令我有點擔心，因為香港現時已有這麼多所大學，就讀的全部也是香港人的子女，由香港的教師任教，現在我們怎可以向這些人說，你們容許我多撥一點錢來發展某一所大學，但卻不是每一所大學都可獲撥款這樣做。我覺得，如果某些大學有意作這樣的發展，最好是鼓勵它們向外間籌募捐助。其實，現在有大量外國的大學來港籌款，可說是無日無之，亦有不少香港市民樂意捐助的。然而，政府在教育方面是有制度的，如果政府對某些大學差一點，而對另外一些大學卻好一點，又怎能說服學生家長？怎能說服學生？怎能說服老師？

主席，這份報告提出了很多建議，我相信會觸發很多討論；在議事堂內和社會上已進行過很激烈的辯論，因為正如剛才張宇人議員說過，即將進行的是翻天覆地的改變。如此情況下，如果我取不到共識，我是不會支持政府急速推行改革的。大家繼續進行多些討論吧。

我謹此陳辭。

葉國謙議員：主席女士，“亞洲之虎”南韓，在今屆世界盃打入四強，締造歷史，全港球迷看得如痴如醉。老一輩的球迷大概會想起，六十年代的香港足球曾經是“亞洲之光”，從姚卓然、張子岱以至胡國雄，香港足球同樣是虎虎生威。到了八十年代，一代球星相繼退役之後，球隊過分依賴外援，無助本地足球發展，香港足球從此一蹶不振。

類似的故事，同樣在香港的高等教育發生。《香港高等教育》報告建議大學教職員薪酬與公務員脫鉤，容許大學以更優厚的薪酬招聘國際級學者。可是，這項建議只會加劇現時大學花費大筆公帑聘請“外援”的情況。現時已有大學以重金禮聘知名學者來港做研究，容許這些學者無須教學，只要本港大學的名字在國際級的學術期刊出現，即使研究與本港沒有多大關係，平日跟學生各不相干，這些“外援”仍然可算是光榮完成任務。

為了讓“外援”多做研究，其餘的教職員惟有增加教學時數，再沒有餘力進行研究。這些“外援”既不用教學，又不進行切合香港需要的研究，究竟國際級學者在本港的學術界扮演甚麼角色？其實，這方面已受到一些本地學者的質疑。香港會否淪為“朝行晚拆”式的臨時研究基地？百萬年薪，只能換來在國際級學術期刊上大學的名稱，是否物有所值？這都值得我們深思的。

在國際級學者進行國際級研究的同時，以本港的需要為主體的研究，並沒有受到鼓勵。以城市規劃為例，有關本港的題目，政府並沒有善用本地大學的人才和資源，只有將數以百萬元計的公帑交予外國的顧問公司。結果如何呢？耗資 400 萬元的“行人環境規劃研究”，整份研究報告只有對本港街道作出一系列的描述，研究報告主見欠奉。“香港仔港灣專題研究”1 厘米厚的諮詢報告，只有 7 頁算是顧問親身撰寫的，9 頁是問卷調查“數人頭”的數字，其餘都是抄寫意見書，意見和政府回應沒有歸納處理，對於論題的專業意見同樣欠奉。

香港花費大筆公帑資助高等教育和有關學術研究，為何沒有向我們的專家學者請教？怎麼會“捉到鹿唔識脫角”？連政府亦不重視本地的研究，香港的學術水平又怎能提高？難怪在 8 所大學的教職員中，香港培養的博士屈指可數，皆因香港的經驗不受重視。連本土博士投考海關督察亦只有望門興嘆，本港的學術氣氛只會繼續薄弱下去，我們的大學生只會更急功近利，大學只有淪為職業先修班。

“捉到鹿唔識脫角”的問題，同樣出現在“外援”身上。有見及此，當大學招聘國際級學者的時候，大可考慮加入一些條件，例如教學時數，指導多少名研究生，又或要跟本地學者共同進行一些研究，務求善用這些“外援”的知識和經驗，以提高“本地薑”的水平，帶動本港的學術發展。

說回足球。南韓這隊“亞洲之虎”，憑着球隊隊員打不死的拼勁，加上荷蘭籍教練希丁克的經驗和智慧，盡顯亞洲足球的威力。本人期望未來的高等教育政策，也能善用國際級的“希丁克”，帶出本港大學的拼勁，令香港的高等教育發放異彩。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高等教育是社會投資的重要一部分，如何達至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自由黨認為高等教育的目標，一方面是為社會培養足夠的人才，另一方面應該在更高層次和領域上取得傑出表現，追求卓越。因此，自由黨並不反對在有需要時增撥資源，但並不表示容許高等教育資源重疊或浪費。

由於教育資源的確有限——這是實際情況，在任何社會，任何資源都是有限的——我們更應該把資源有效運用，以達致增值的效果。針對報告所提到的擇優撥款原則，一直以來，我們對教育的看法是，在教育普及的基礎上，精英的培育是非常重要的；而報告所提的擇優原則，是表現較好的院校可以獲得較多撥款，自由黨認為這正正是追求卓越的體現，更可以為院校提供誘因，使大學盡量發揮各自的優勢，最終有能力參與具國際水平的競爭。同時，由於教育資源實在有限，我們並不贊成把資源平均分配給每一所院校。事實上，擇優撥款這概念，更能符合基於資源有限而加以善用的原則。

此外，大學的研究工作不單止對大學本身十分重要，對於能否帶動本港整體社會向前也非常重要。故此，我們希望香港的大學能在研究方面擁有卓越的成績，甚或在某些領域上可以超越國際水平，而不應放棄有能力、有成績的大學在研究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本港的教育資源有限，加上本港大學的研究經費向來不及國際知名的院校，所以擇優撥款原則更能切合本港的實際情況，使院校的研究工作能更精確地朝着更有需要的目標前進。

我要強調，自由黨並非不支持大專普及政策，只是我們認為不能因此而放棄一些更高層次或更專門領域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因此，在資源限制之下，擇優撥款原則更顯重要。

此外，在《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發表後，由於資源問題，引起現時大學是否過多，以及有否需要在某程度上進行整合等議論。對此，我也想談一談我的看法。早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即候任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先生

建議，把地理上相近的大學合併，以互補長短，集中資源。對此，我們認為非常值得考慮，而且具討論價值，因為歸根究柢，這始終關乎如何最有效運用教育資源這問題。

目前，我們有 8 所大學，每所各自提供不同的課程。有些課程是重疊的，從資源的角度考慮，難免會有些浪費。此外，一些新辦的課程，例如最近頗受歡迎的中醫藥課程，好幾所院校都爭先開設。現時大學自主，但卻沒有人能作統籌或協調，確保社會資源投放最有效得宜，以及最符合香港的整體發展和利益。這的確是專上教育改革應徹底考慮、關注、討論，而且作出決定的一環。

主席，剛才劉慧卿議員提及一些院校的教職員的看法；也有數位議員表達出十分強烈的反應，特別是談論到薪酬與公務員脫鈎的問題。無可否認，任何人面對既得利益可能受到威脅時，自然的反應是憂慮。我不反對進行討論，但是否要如劉慧卿議員所說，一定要達到共識，我則對此不表樂觀。對於一定要在達到共識後才能推行政策這說法，我更絕對不同意。我覺得在一個社會，是經常無法達到共識的，儘管有些人會有絕對的堅持。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在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的基礎上進行討論。進行理性的討論，我十分同意，但無休止的討論，我則不同意。香港近期被自己人及外人都批評議而不決。我覺得我們應該反省，因為不單止政府好像議而不決，我們整體社會是否也有這樣一個現象呢？事實上，世界是沒有這麼理想的，有些事情是無法得到百分之百的人的同意，而且越是涉及自己的利益，越難徵求每個人都同意。因此，我認為不能在說的時候便十分動聽，但卻無法做到，這對香港整體社會的發展是相當不理想的。因此，我希望大家能針對專上教育的發展來作考慮。

司徒華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 2000 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在 10 年內，要把適齡人口的專上教育普及率，由 30%翻一番，提升至 60%。這是一個類似“超英趕美”的大躍進計劃。《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是為這項計劃服務的工具。報告其中的建議有 12 項，但要害是 4 個。

第一，院校教職員薪酬及聘用條件與公務員制度脫鈎，由院校自由彈性決定。

第二，以“自負盈虧”、“用者自負”的私營運作方式，開辦和增加副學士學位課程及程度相若的課程。

第三，把現有的 8 所院校劃分為研究型 and 教學型，突出少數院校為撥款重點，亦即優先獲得較多資源。

第四，推行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以誘使學生轉移和流動；這制度將會進一步發展為根據學分量取代按學額撥款給不同的院校。

這 4 個要害，反映了為貫徹執行“超英趕美”大躍進的最高指示，罔顧現實和教育特點，以所謂“自由競爭”機制，強行實施於非經濟領域。在過去 5 年，在其他方面的管治思維都有這特點，而這次則變本加厲。

首先，無視教育是人的事業；是百年大計；是發展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的重要措施，其成果是全民共享的，政府要責無旁貸地投入資源。現在，對高等教育不但削減撥款，還進一步“我點菜，你找數”。相信在未來實行的中學改六年制、大學改四年制，大概都會採取同樣的方式。這樣必然會影響教育質素，增加家長負擔，打擊教育工作者的士氣。

其次，不但不注意階級分化，反而在各個方面無孔不入地加以劃分。不是鼓勵各院校發揮所長，各創特點風格，反而把它們劃分等級，不公平地分配資源。這樣院校分了等級，畢業生也有等級的標籤。這也是一種分化，在未來的知識和專業階層，也起了分化的作用。

再其次，以人治取代法治，以個人愛惡取代之已久之制度。公務員薪酬有一定的制度，與之脫鉤而自由彈性決定，便是沒有制度，變成了憑個人愛惡的人治。政府即將向本會提交的“立法減薪”，便是要破壞既定的勞資協議，難怪現時又準備向院校教職員“開刀”。

最後，誘使學生轉移流動，美其名稱之為一種自由競爭，實際上是摧毀學生的歸屬感，鼓勵他們看風駛輊、見異思遷、趨炎附勢，培養出惡劣的品格。有人或會認為，在商業上，表現出這樣的品格，無可厚非；現在，難道在教育上，也要掀起這樣的風氣嗎？

假如報告中的這些計劃落實的話，我預見將會是高等教育的大災難。高等教育是整個教育事業的尖端，對其下的基礎教育必然有重大的影響。目前，被已推行的所謂“教育改革”帶來種種困擾的基礎教育，將來實施了這些建議後，將會產生更多的問題。

即將上任當高官的李國章先生，曾對這份報告發表不少批評。我期望他能堅持自己發表過的正確意見，並傾聽其他意見，尤其是曾經是他的同工的

院校教職員的意見。我期待他對香港未來的整個教育事業問責外，首先要對自己所說過的言論問責。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主席，襯托今天的辯論的，是大專講師、教授上街。特區政府其實絕對不是無能，最有能力是搞人上街，因為特區政府令本來安穩的變成不安穩。不知道將來會否終有一天常任秘書長也要上街呢？

為何大專講師、教授要上街？原因很明顯，打開整份報告，我們看不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類警世真言；相反，我們只聞到一陣陣的銅臭，看到政府為大專教育資助“封頂”、“縮水”等立心不良的“陽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是很坦白的，絕無不可告人的隱閉議程。報告的中心思想可說是“一字咁淺”，便是一個“錢”字。董建華政府提出在 10 年內，要令六成適齡青年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後，教資會的唯一神聖任務是如何不用高等教育經費翻一番，便可令高等教育學額翻一番。要做到請客食飯但又不用自己付鈔，唯一的方法是找別人付鈔。報告提出副學士課程要自負盈虧；大學教職員薪酬要與公務員脫鉤，結果便是變成董建華請客，大學職工及學生付鈔，完成他的教育目標。

本會在兩星期前曾辯論副學士課程的改革建議，我不想在此重複，我只想說出一點，便是以後學生，特別是那些成績不太好，要修讀副學士課程的學生，要借到“周身債”才能讀書，稍窮的學生可能在考慮過後不會再讀書。這種制度只會令香港的教育越來越倒退。

工人不是游水海鮮，他們的工資不可以掛上“時價牌”。工人要的是一份安穩工作、穩定收入，才能安排和計劃未來的生活，例如是否結婚生子、供樓等。大學的知識勞動者更要一份安穩工作、穩定收入，因為教研工作本身是一份終身事業。即使退一步說，如果一名教授職位不穩，經常要憂柴憂米，以致心緒不寧，試問如何全情投入教研工作呢？現時大部分新入職的大學教員已經不是獲終身聘用，他們的薪酬亦與公務員脫鉤；有部分更是一年只有 9 個月的教學合約，能否續約還要視乎下學年可否從不知哪裏擠出多一點錢。在如此惡劣的工作條件下，怎可能有高質素的研究呢？他們的薪酬與公務員脫鉤後，情況會變本加厲。

除了教員之外，大學的職員，特別是基層員工更人心惶惶。我相信在薪酬與公務員脫鉤後，將會有更多大學保安和清潔職位外判、文員亦要減薪。兩年前有工會調查發現，大學外判清潔及保安工人所得的工資僅足糊口，而部分外判承辦商更違反勞工法例，沒有給外判工人休息日和病假，這是象牙塔內最可耻的一幕。

早前哈佛大學的學生為了爭取改善外判工人的待遇，幾乎與校長反面，我希望這種追求社會公義的教育不會在香港出現。畢竟，學生的教育不應建築在工人的痛苦之上。不過，估計這情況會持續下去，日後學生真的可能要出來協助工人爭取權益。

主席，教資會提出的學分轉移制、研究撥款採用擇優準則等建議，其實是要將高等教育市場化。市場邏輯標榜弱肉強食，如果走到極端，便是不擇手段，這與教育理念的春風化雨、洗滌心靈，可說是格格不入。純粹以市場邏輯改革高等教育，結果只有一個，便是註定以失敗告終。要市場有效運作，讓錢跟學生走，便要有一堆可以量化的指標，最好還可以變成一堆堆的價格信息。但是，教育就好像周兆祥先生所說，是心對心的刺激、誘導和轉化的工程。這項工程天生難以量化。在強行量化教育表現和研究質素的過程中，可能由於字形相近，很容易把“馮京”當作“馬涼”，把“量化”變成“異化”。

在教育買賣市場中，要學生知道甚麼是學問，實在太抽象；要學生追求學問則更抽象。學生如何選擇呢？他們可能要知道哪個教授會派出最多“火箭”，即派出最多“A”；這學科是否市場“搶手貨”，讀完後是否很多僱主爭着聘請。這樣便清清楚楚，有數得計。如果是這樣量化的話，教育便會淪為一個市場，而不是真正的知識傳遞。

主席，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先生接受《明報》記者訪問，談論這份報告時，連續說了 8 聲“很嘔”，再加上 3 句“很荒謬”。他要表達的信息，是很清楚的。教育本身並非一件普通的消費品，用於評估教學質素的資訊極為貧乏，教育的供應和需求，無可避免受制於市場失效。因此，教育既然不可以當作商品；既然不是酒樓的“一蚊一隻雞”；既然不可以完全商品化和市場化，所以我們反對現時教資會所提出的多項把教育變成市場商品的建議。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主席，《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提出數個重點，第一是擇優撥款；第二是精英培育；第三是薪酬脫鉤。我想就這 3 個問題提出我的個人意見。

有關擇優撥款方面，剛才很多同事也提到，這很可能把我們現在學府所教授的科目推向市場化，令市場決定何謂好、何謂不好。如果好的話，便增加撥款，否則，便減少撥款。但是，問題在於何謂好呢？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怎樣衡量為之好，以及採用甚麼準則來衡量。我覺得這是很難解答的。

有院校聘請了一位國際級的教授做研究工作，取得成果便算是好，可獲多撥資源。但是，另一所院校表示，校內的學生的成績由不好普遍獲得提升，而且他們教授所有科目，不是只教授市場走勢的科目；學生除了學術成績提升外，做人的品格也提升了，這是否也是好呢？如果是的話，便要增加撥款。可是，報告似乎認為這不算好，一定要在學術做出成績才可以獲增撥款。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不禁要問，究竟我們的大學教育的目標是甚麼呢？是為了我們的整體社會，抑或只是為了經濟？人的品格、人的行為、人的信念、人的生活模式，是否也須提升呢？

如果大家同意擇優撥款這原則，請告訴我採用甚麼準則；怎樣來衡量。如果說不清理念，便可見這做法是行不通的。為甚麼行不通呢？因為很多院校會因應政府所想來做事。舉例來說，現時董先生經常說科技、科技、科技，院校便會多找一些具高科技專長的教授來港做研究工作，如果做出成績，便可以獲增撥款。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的社會科學怎麼辦呢？這不是董先生所喜好的。最後大學學府內便會衍生我經常批評的“擦鞋文化”。事實上，是很容易出現這現象的，因為要投其所好，他們認為好的才做。

“擦鞋文化”其實現在已經存在，不用等將來。現時大學不斷要求老師要做出好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國際期刊。問題便出在這裏，研究成果怎樣才有資格刊登在國際期刊呢？不是任何研究成果也可以，這些期刊很多時候要求研究是就一些重大問題、一些整個世界也關心的問題來進行，要很突出的問題才會刊登；一般的問題，特別是一些本土問題，未必會受國際期刊重視。因此，很多老師已經跟我說，為了要投其所好，希望爭取國際期刊刊登研究成果，所以必須迎合他們的要求，迎合他們的喜好。然而，這間接會為學術自由造成很大的阻礙，帶來很大的打擊。一位學者想進行研究，但發覺完成後，沒有期刊會刊登，那研究來做甚麼？沒有期刊刊登其實並不要緊，最糟的是會影響院校不能成為一級學府，得不到政府資助，不能獲得較多撥款，他本身的“飯碗”也會不保。因此，我覺得這會間接打擊學術研究，忽視學術自由。

至於精英培育方面，我們現時確實要精英人才，但問題在於我們要多少精英人才。很多工商界朋友不斷說欠缺人才，要外聘人才。但是，他們有否想過，我們提出的精英培育要培育多少精英呢？1 個、兩個；100 個、200 個；還是 1 萬個、2 萬個；又抑或是一百二十多萬，二百多萬個呢？我們要考慮清楚所謂精英的數目是多少。如果我們所說的精英只是數十人的話，我覺得對工商界並沒有多大幫助。

工商界現時要聘請專才來港，因為香港欠缺人才。我們的社會真的很缺乏人才，但我覺得人才不是集中在數十人或數百人，而是市民的學術、技能及知識必須普遍獲得提升，才會有效果，社會才会有進步，否則，只是培育個別精英的話，對整個社會是沒有幫助的。事實上，工商界現時可說是自食其果，因為他們沒有大力推廣普及專上教育，令有些人不能上大學，最後因成績不好，得不到成果，不能幫助整個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希望大家說精英培育時，不要只說培育一小撮人，而是希望如果有 60%的人可以入讀專上學院時，60%的人都應該成為精英，這樣對社會才会有幫助，否則，是沒有意思的。

最後，我想談一談薪酬脫鉤這問題。我希望大家明白，做學術研究是要經過漫長歲月，不是一兩天或短期內便可以做到。如果學者沒有固定收入或穩定工作，他們怎樣進行研究呢？他們怎會有心進行研究呢？他們怎會花心思進行研究呢？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我們不能空口說做多些研究，但實際上半年後便可能沒有資源。試想他們怎會放心和放手做研究呢？

我希望局長考慮清楚，當一個人不清楚知道自己的生活是否穩定，便不能專心做研究。大家也明白，研究是不會在短時間內有成效的，一定要花頗長時間，所以一定要給學者安穩的職業、穩定的收入。這份報告建議與公務員薪酬脫鉤，是做不到這點的。此外，薪酬與表現掛鉤後，奉承文化便會出現。專上學院過去已被人批評有這現象，我很擔心將來可能也會有這現象。

主席，我謹此陳辭。

曾鈺成議員：主席，我首先想提一提局長，這份《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的中文翻譯相當差。李鳳英議員剛才所引述的一句話，令我嚇了一驚，但看真後，卻發現原文並非那個意思。李鳳英議員剛才所引述的第 1.17 段，是說大學的主要功能是創造經濟機遇，但怎麼可以這樣說的呢？如果翻看原文，便會發現意思其實並非那樣，但這不能怪責李鳳英議員，因為中文譯本的確是如此。

主席，讓我又讀出一句。我本不想批評語文的，只是順帶一提。我要讀出的一句，是在第 6.35 段，全句有 34 個字，但中間卻完全沒有標點，看看大家能否明白。那句話是這樣的：“必須積極地減少對教育界的規管和增強面對國際競爭的適應能力是絕對必需的。”這句話前面有“必須”一詞，後面又有“是絕對必需的”，分別用上了“須”和“需”。我反覆地看，還是弄不清究竟是在談論一件事、兩件事、還是三件事。總的來說，這種例子在這份報告中是屢見不鮮。我認為這是不甚像樣，因為所說的題目是高等教育。這樣的中文實在不大好。

我主要並非要談論這方面。對於這份報告，我無意像剛才有些同事那樣，提出尖刻的批評。這份報告由始至終都在談論資源；說得簡單一點，便是一個“錢”字。例如報告建議撥款應如何分配；給予重點院校較多資源，而不是把資源平均分配；教師薪酬不能跟公務員掛鉤，大家不應獲發相同薪金，而是應該有些得到很高薪金，有些則只有很低薪金；學生可在某院校修讀部分學分，然後再到另一所院校修讀其他學分，政府不會按學生人數向院校撥款，而是按院校所派出的學分撥款。由此可見，整份報告都是有關款項的分配。

在整份報告中，“擇優”和“競爭”這兩個詞出現了很多次，差不多由始至終都在談論這兩點。總結中提出了整體的精神。英文本所用的字是 **deregulate**，我不知道中文應該怎樣翻譯，亦記不起中文本是怎樣翻譯。可是，如果看中文譯本，肯定是不會明白，因為中文的翻譯實在差劣，不知它在說甚麼。**Deregulate** 一詞的意思大概可以明白，即是說不要一律、不要限制，而是要靈活、開放。此外，報告中又多次提到市場，說是要依靠市場力量。

不過，我很擔心高等教育的發展能否那麼依賴市場力量。我認為基於普遍和特殊這兩個理由，我們是不應這樣看的。在一般情況下，高等教育的所謂市場主導，即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存在着問題的。

所謂的市場，究竟是指甚麼呢？我們的學生會因應目前市場上最需要的人才，爭相選修有關的課程。主席，我記得我進大學時，由於申請了生活津貼，所以便要到委員會接受面試。委員會主席問我估計進了大學每月約要花費多少。我根本沒有準備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所以便胡亂答了一個估計數目。那位主席望了左再望右，帶笑地說：“你們看，我早已知道修讀數學科的人，數口是最差的。”他的意思是我不懂得計算。六十年代的大學生便是這個樣子的了。可是，過去 20 年修讀數學科的大學生，他們的數口卻是非常好的。因此，他們都修讀了醫科，因為有一段期間，當醫生是很吃香的。據我所知，香港大學的醫學院便取錄了全部在 **A-Level** 考試中，兩科數學科均考獲 **A** 級的學生。

然而，到了接近 97 年時，學生又憂慮到 97 年後，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當醫生是否真的那麼可靠？再加上醫科須攻讀 5 年，時間實在太長，所以聽說在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學生便不再選讀醫科，導致大學醫科所取錄的學生，成績越來越差。數學科考獲最佳成績的學生，紛紛轉讀工商管理，因為攻讀的時間較短，以及在世界各地均能應用。誰知畢業後，這羣畢業生遇上了金融風暴，在商界難有理想發展，以致畢業生很難覓職。聽說，現時大學的理科已能慢慢招收到成績較佳的學生了。過往多年，數學系是不能招收到數學科成績優異的學生的，但在近年，似乎已可招收到少許考獲較優良成績的學生。不過，到了學生畢業時，又不知道世界會怎樣轉變。換言之，高等教育所提供的培養，一定是滯後於社會需求的。現在普遍認為是好的行業、好的出路，待畢業生投身社會時，便已是落後於社會的變化了。我已經不說是否單單衡量市場而不理會學術要求的了。我認為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

香港的社會是非常特別，因為香港地方細小，只有 8 所大學。在 8 所大學中，最佳與最劣的一所比較，現時的差別實際上並不大，但如果是將美國的名牌大學與較劣的大學比較，兩者便真的相差很遠。現在政府是否要人為地製造差距、擴大差距呢？如果將更多資源投入其中少數的重點院校，便等於其他院校所得到的資源是少了。香港只有這麼少數的大學，我們是否應該這樣做呢？此外，脫鈎亦是一個問題。鑒於香港只有這麼少數的大學及教師，我們是否要為教師製造薪金上的差距？所以，我覺得在香港的特殊情況下，是要審慎地考慮這份報告所提出的建議的。謝謝主席。

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教育帶給人希望，帶給人自信。大學教育更應肩負起培訓有學識和批判能力的人才，在社會文化、民主、科學和經濟等領域作出貢獻。不過，令人失望的是，整份《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並沒有就如何加強和落實這個使命及信念作出探討和建議，更沒有處理增加大學學額的問題，反而處處以金錢掛帥，利字當頭，商業味濃，的確令人失望，令人惋惜。一言以蔽之，實是見“利”而忘“義”。

為甚麼說報告是見“利”而忘“義”呢？這是因為當中的建議大多是着眼於培訓切合高增值社會需求的人才，但卻窒礙了其他較少人修讀和較小型的學系的發展。此外，為求節省撥款，更巧立名目作出大學教師薪酬與公務員薪酬脫鈎的建議。凡此種種，都是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的短視建議。

在有限公共資源的情況下，報告提出了擇優的原則，用意是在不同的院校中，選擇具有卓越表現的學科作重點資助，希望將大學的強項也拔尖一

番。可是，如此一來，一向較少人修讀，但着重道德價值和理性思維的人文學科等，卻可能因為資源進一步減少而遭受淘汰。主席女士，將適用於商界的弱肉強食理論強套於教學事業上，對我們的下一代確實是沒有好處的。

報告指出不再資助副學士課程，我在此表示強烈不滿。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曾豪情壯志表示，要將大專學額增至適齡的六成，但現時卻停止資助副學士課程的學生，令學生因未能得到學費資助而卻步；這種政策上的矛盾，形同是自打嘴巴。

隨着社會的需要，越來越多辦學機構開辦副學士課程，而有關的課程亦趨向與外國的大學銜接，副學士課程遂逐漸成為升讀大學的另一途徑。例如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便計劃於明年與加拿大某著名學府合作，讓修畢副學士課程的學生再多修讀兩年銜接學位課程，便可取得該大學的學位，這較到加拿大升學最少可節省四十多萬元。在經濟低迷時減少資助副學士課程，令有志取得大學學位的學生卻步，便等如落井下石，抹煞了他們的學習機會。

主席女士，近來很多檢討，處處都是針對公務員和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和福利，政府也作出了很美妙的配合，挖空心思，務求將他們“榨乾榨淨”。這份報告亦不例外，建議大學薪酬與公務員脫鉤。大學的工作環境講求穩定，如果大學教職員的薪酬福利浮動不定，大學便再不是一個安心教學和着重研究的好地方，最終受苦的只會是我們的學生。其實，這個問題同時亦發生在我所服務的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上。醫管局多次引入不同的政策，剝削新入職員工的福利和薪金。今天我便接獲 1 宗投訴，向我表示對於醫管局最近可能會取消新入職員工增薪點的做法，感到無奈及彷徨。

主席女士，哀莫大於心死。對於政府一次又一次試探專業人士的底線，我感到痛心和憤怒。專業人士本着專業精神，以專業知識為市民服務，但卻換來一次又一次的無情對待，實在傷透了我們的心。我希望這次對高等教育所進行的檢討，能令政府反思一下對專業人士應有的態度。

我謹此陳辭。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教育統籌局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就本港的高等教育提出了重大的大學改革議題。其中的建議，例如“精英教育”、“學分轉移制”、“申訴專員兼管大學”，以及“成立延續教育局”等如果付諸實行，將對香港的高教發展產生相當深遠影響。因此，作為負有廣泛代表性的立法機構，有責任作出進一步討論，以期集中更多社會意見，取得更多共

識，供負責相關政策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局長在其任內參考及作出更好的決策。

其中引起最多爭拗的，是擇優原則主導的資源分配政策，定出具有超卓表現的院校及有關人員，可獲得適當資助，扶助他們達到國際一流水平。報告指出，香港的高等教育如要保持國際競爭力，必須集中資源發展重點大學的教學及研究。此外，由於政府出現嚴重財赤，資源也不可能無限量地投入，所以只能選擇性地資助某些回報較高的教研項目。凡此種種，似乎最終都是以效益為依歸，以市場作為指引，令人不禁擔心，教育會否走上商品化的道路。此新政策顯然不大受一批建校歷史較短的新晉院校歡迎，它們也為此提出頗多質疑。本人明白報告中這些建議，旨在讓各院校通過互相競爭，提高教研質素，但本人亦擔心這些政策所帶來的副作用，頗有好心未必做好事，好心可能做壞事的隱憂。對新院校來說，跟名牌大學競爭資源，似乎有如以卵擊石，必輸無疑。同樣地，沒有政府資源適度注入，新院校也恐怕難以維持。因此，在一個短期間內成立多所公營大學所帶出的資源分配問題，的確值得深思、研究；深思一下在低稅制下，香港在高教資源方面的承受能力，以及研究一下利用社會各方資源開辦私立大學的未來路向。

在現行的公營資助情況下，報告附錄五有關根據學分量決定資助額的擬議方案，引起了很大反響。在學分累積及轉移的制度下，學生自然有更多選擇權。這對最初不能入讀心目中名牌大學的學生來說，當然是一件好事，而從另一角度來看，亦有利促進各校之間的學術交流。可是，學生轉校、學分轉移，資源也隨之轉移，形成“錢跟學生走”的現象，又是否真的沒有副作用呢？一般來說，在利字當頭的社會，學生當然選擇入讀名氣較大的院校，新晉院校在這方面肯定漸被遺棄，或成為過渡性的機構，難怪它們覺得這是一場不公平的競賽，最少會出現惡性循環的結果。因此，靠學分和市場效應來左右大學研究經費的多寡，除了使大部分資源流向名牌大學外，很大程度也導致扼殺了新院校的發展前途，更令人擔心由此而產生課程質素的問題，最終受損的仍會是香港的教育。

歸根究柢，我們還是須重新帶引社會產生共識，究竟香港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目標為何？因為只有是大家明確知道了目標，我們才會有更明確前進的方向及信心。究竟我們單是要跟國際一流學府看齊，將大學教育等同經濟利益看待，還是要培養文化創造、精神道德、發展結合香港自有特色的教育政策方向呢？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一場持久戰，肯定不是一時三刻便可看到成績的。所以，合理而穩健的財政投入，是政府對教育的實質支持。同時，政府在政策上應考慮對私立院校作出妥善安排，否則只會變相迫大學走向教育商品化，淪為市場化之下的一個犧牲品。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尚有議員想發言？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現在已過了晚上 10 時，我們仍有另一項議案須進行辯論，但聽了多位同事熱烈討論這項議題後，我也有少許話不吐不快。

自由黨的看法和立場，周梁淑怡議員和張宇人議員剛才已經談過，但我仍有少許話想說一說。過去數年，我曾跟許多大學生有合作機會。有時候，我們聽到別人以“象牙塔”來形容大學，但我對此譬喻則不敢苟同。其實，我們也須考慮一下，很多時候，我們的理論也是在“象牙塔”內產生的。我剛才聽見多位議員大聲疾呼地為下一代爭取更多資源或保持現有資源。然而，我們是否應看一看，在現有的資源下，我們學生的成績是怎樣？他們有否好好利用校園？是否有人知道箇中情況呢？

過去 1 年，我曾跟學生進行了十多次研討會，每次也長達 3 小時，所以很詳細地跟他們探討過。今年有較多學生找我，因為很難找尋工作。我每次也花上 3 小時跟他們討論，但我有數點是不吐不快的。第一，就學校的情況而言，在負責聯絡學生的部門內，是有多位同事在工作，我以為他們真的會聯絡學生、關注學生，給予學生另類的依傍，豈料他們最懂得做的，似乎只是發送電子郵件，根本沒有人跟進是否有學生看那些電子郵件，亦沒有人理會那些信息的接收情況是怎樣。曾經有一次校方要求我演講，你們猜那所學校最終有多少人來聽？只有 1 個人。

第二，我曾問很多學生是否知道他們的校風如何、有何特點，但卻沒有人知道甚麼是校風。我請他們問一問老師甚至校長，但有些學生卻顧左右而言他。這便是我們投放了大量資源後，所看到的院校的情況。我不知道實際上發生了甚麼問題。我曾嘗試詢問部分校長對這項議題有何意見，但他們並不如我所認識的一般校長那樣感到關注。

第三，懂得自發地找我的學生，其實已是很好的學生了。我曾請有備課習慣的學生舉手，但卻沒有很多學生膽敢舉手。我又問他們曾否備課，在一班 30 名學生中，只有一個半個舉手。我問他們為何不備課？學生回答說因為老師沒有要求。我問他們，這樣豈非白白繳交學費？學生卻不懂如何回答。這便是我們投放了大量資源後的情況。我提出來，只是想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們真的想為下一代爭取資源或保留現有資源，最主要便應該問，這些資源實在是如何使用，以及我們的下一代是否真的接受到這些資源的充分滋潤。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於 3 月下旬發表了《香港高等教育》的報告，為本港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提出了一系列策略性建議，同時進行公眾諮詢。其後，教資會順應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把諮詢期延長至本年 7 月底，讓社會人士、教育界及學生可就報告內的各項建議作更深入討論，並向教資會反映意見。

我歡迎楊耀忠議員今天提出議案，帶動立法會全體議員討論香港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亦多謝各位發言的議員提出寶貴意見。由於目前教資會的報告仍處於諮詢公眾的階段，政府對教資會的建議並沒有既定立場，所以我無意就議員的發言逐一作出回應。至於副學位課程的資助模式，我們兩星期前已辯論過，我不擬重複。今天，我希望與大家探討高等教育的現況、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規劃未來發展的一些基本原則。

首先，讓我界定一些很容易被混淆的名詞。其實，“高等教育”是指學位或以上的教育，而“專上教育”則包括了中學以後的所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是專上教育的一部分，而專上教育還包括了專業文憑、高級文憑及副學士學位等，這些資歷統稱為副學位。教資會的工作主要是針對高等教育，但由於兩所教資會資助的大學同時提供受資助的副學位課程，所以教資會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亦觸及副學位課程未來的監管和資助模式。

香港的高等教育，由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迅速發展。17 至 20 歲年青人的入學率，由 1985-86 年度的 5%，上升至 1995-96 年度的 18%。此後，首年的大學生人數一直維持在 14 500 人的水平。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政府投放了大量資源，擴充大學學額，鼓勵研究和提升各高等教育院校的質素。

今天，我們共有 8 所受資助的大學，2001-02 年度的資助額接近 14 億元，佔政府整體開支約 6%。8 所大學共提供約 8 萬個相當於全日制的學額，其中 4 000 個為研究生名額。教資會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並非為了節省資源，反而是要加強大學的管治，增加資源運用的靈活性。事實上，如果要落實教資會的建議，將會涉及數以億元的額外開支。

教資會在九十年代中期曾對高等教育進行一次全面檢討，評估擴充學額後的一般情況及未來發展。當時，社會上對“量”的提升所帶來“質”方面

的變化，深表關注。教資會當時的結論是，增加學額無疑會令學生的平均質素下降，但香港的整體入學率仍然偏低，大學生的整體質素依然良好。然而，有兩方面是值得關注的：第一，學生的語文和社交能力未如理想；第二，較少人報讀的學系，學生的質素亦稍遜，須加強培育。

教資會當年的結論，仍然切合今天的情況。可是，隨着香港學生往外國升學的趨勢有增無減，香港的大學收生質素無可避免會再受到沖擊。按我們估計，每年約有 7% 的中學畢業生往海外升學，亦有不少學生在中學階段已負笈海外。長遠而言，我們不必因此而擔憂人才流失，香港只要保持國際都會的地位，自然能夠匯聚人才，吸引畢業生回流，補充香港的內需。事實上，自 1997 年香港回歸以後，有不少海外畢業生都回來香港工作，為香港注入兼具中西文化和國際視野的人才。

至於香港的大學畢業生，隨着入學率增加，質素參差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不過，一些熱門學科的學生依然非常出色，較諸早年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受到更優良的師資薰陶，有更高質素的學習環境和更全面的學習經歷，例如通識教育、交換生計劃和宿舍生活等。此外，香港的大學生亦在國際比賽中屢獲殊榮。

自 1999-2000 年度起，政府每年都調查僱主對大學畢業生的滿意程度，數年來情況相若。約 70% 的僱主對大學生的表現感到滿意，其中約 13% 非常滿意，亦有 6% 感到不滿意。僱主普遍對畢業生的資訊科技知識、中文水平及工作態度較為滿意，而最不滿意的便是普通話、英語及分析問題的能力。由此可見，香港學生的語文水平始終是社會最關注的課題，而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大學，而是基於中小學的課程、教學法、師資、學生學習動機和語言環境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現正進行的教育改革所要處理的事項。

至於教研的質素，過去 10 年，教資會引入了多項質素保證機制，以確保大學教育的質素，包括研究評審工作、教與學質素過程檢討、管理檢討等。無可置疑，本地高等教育界整體的教研質素近年不斷提升，尤其在研究方面。隨着政府投放的資源不斷增加，各院校在競爭壓力下，無論在質與量方面都有顯著進步，更有個別研究項目達到國際水平。

在 1991 至 2000 年的 10 年間，教資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共資助了超過 4 000 個研究項目，而研究經費則由 1991 年的約 1 億元，增加至 2000 年的 4.7 億元。不過，與其他發達地區相比，香港投放於研究的經費依然偏低，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約 0.5%，台灣為 2%，內地則為 0.8%。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建議，為配合知識型經濟發展，各地區的研究經費指標，應該定為本地生

產總值的 3%，但該組織更鼓勵工商界大力投資於研究活動。剛才，不少議員批評報告只着重資源分配，沒有考慮到教育的理念。其實，報告的第一章已開宗明義探討了大學在香港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而附錄二亦提供了本地高等教育的整體面貌，以及社會發展的急速轉變對院校的影響和提升質素的關係。

大學的核心工作無疑是創造知識、培育人才和服務社會。學術界通常以研究工作奠定個人地位和聲望，很多教授都視教學為職業任務，而服務社會則往往放在較次要的位置。隨着時代轉變，大學的使命亦須作出調校。在社會不安、經濟轉型的時期，大學肩負更重要的責任，要擔當社會的照明燈，不偏不倚地帶動討論社會問題，凝聚社會力量，以扎實的研究為基礎，協助推動社會發展。正因為這一項神聖責任，大學應享有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避免受到外界壓力或政治干擾。

前哈佛大學文學及科學院院長 Henry ROSOVSKY 曾經說：“只有 3 種人配穿袍戴帽，他們便是牧師、律師和教授，因為他們代表正義和公平，他們是社會的良心。”這些都是社會對大學和高等教育界的期望，我亦希望教授們能夠自重。

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都受到知識經濟浪潮和全球化沖擊，而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改革。1998 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在世界高等教育會議上指出，“世界各地深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目標，是要提供有利終身學習的環境、引發文化的辯論、確保社會多元性，以及整固人類的智慧和道德標準。”要達到這項目標，高等教育的改進和革新，必須以擇優為收生基礎、改進大學管治質素和質素保證機制、服務社會，以及與實際的工作世界建立更密切的聯繫。在享有自主和自由的同時，高等教育院校必須向社會負責，亦須向公眾問責，以平衡權利與責任。

在香港，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要進一步深化大學的使命，亦要回應社會當前的需要。在制訂未來的發展藍圖時，我們要顧及以下數點的考慮：

- (一) 大學是孕育精英的場所，大學生是社會未來的領袖，所以大學必須嚴格保證教學質素，確保大學畢業生符合社會期望；
- (二) 高等教育是整個教育系統的一部分，大學有責任扮演教育改革火車頭的角色，通過收生政策、師資培訓、課程改革和教學研究等帶動和協助提升中學教育的質素，令大學收生得到更佳的質素保證；

- (三) 高等教育既是公共服務，也是個人投資。政府、社會及個人必須共同承擔高等教育的經費。現時，本港各受資助大學的財政來源主要來自政府，學費收入只佔成本 18%，私人捐款更只有 3%至 4%，較很多其他發展的地區低得多；
- (四) 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我們有責任善用資源，促進大學間的分工合作，減少無謂的重複和浪費。我們要將資源投放在院校的強項上，令資源可以發揮最大的效能；
- (五) 香港要在知識經濟中保持競爭力，必須提升市民的學歷水平。長遠而言，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增加大學學額；及
- (六) 在終身學習的社會裏，高等教育的制度必須保持靈活和多元化，並與教育體系內的其他環節接軌，提供多個進出渠道，方便和鼓勵終身學習。撥款機制亦要與時並進，以支援發展終身學習的社會。

二十一世紀是全球一體化及知識型經濟的時代。香港目前面對經濟轉型和與內地經濟磨合的關鍵時刻，高等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尤為重要，肩負着為商界、政界和教育界培養優秀人才，以及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任。

教資會的報告，就高等教育的發展提出了高瞻遠矚的方向性建議，各位議員剛才提出了很多值得我們參考的論點。現在距離公眾諮詢期結束尚有一個多月，我希望各界繼續踴躍發表意見，集思廣益。教資會和政府會細心研究公眾對各項建議的意見，然後制訂切實可行、循序漸進的時間表及合理的資源調配策略。我相信即將上任的問責制局長是有能力引領香港的高等教育走向卓越、促進學術界跟政府合作，並加強高等院校與社會各界的聯繫，以孚眾望。

主席女士，今天是最後一次在立法會的全體會議以教育統籌局局長身份發言，我藉此機會感謝各位議員過去兩年對教育統籌局各項工作的關注和指導。兩年來，議員就教育政策範疇一共提出了 153 項質詢和 14 次議案辯論，亦向政府提供了很多寶貴和實際的建議。我希望日後在議會外繼續與大家溝通合作。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謝謝各位。

主席：楊耀忠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3 分 50 秒。

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我很感謝十多位議員今天就這項議題發表了他們的看法及意見。一如所料，大家對教育問題，是持有不同的看法及觀點，但我相信這次辯論帶出了一個很強烈的信息，那便是對於高等教育改革，希望政府能三思而行，更希望政府能慎重處理基本的教育理念及同工的利益。

正如局長所說，她今次是最後一次以教育統籌局局長的身份在立法會發言，我很多謝局長在過去兩年來，給予教育事務委員會大力支持，亦希望局長將來以常任秘書長的身份，與立法會建立新的夥伴關係。我特別希望局長將立法會各位同事今天所發表的意見帶給候任新局長，因為教育改革實在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們的高等教育改革，能夠有理、有利及有節地進行。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楊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X X X X X X X X